

暨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项目资助

姜清波 著

入唐三韩人研究

入唐 三韩 사람들에 대한 연구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暨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项目资助

姜清波 著

入唐三韩人研究

入唐 三韓 사람들에 대한 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入唐三韩人研究 / 姜清波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81135 - 440 - 9

I. 入… II. 姜…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朝鲜—研究—唐代
IV. 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7383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言

19 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世界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当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学习某些独特的技术，但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鉴用。或许，我们应该记住毛主席的劝告：我们能从反面经验中学到某些东西。的确，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我们观察、考虑并可以从中得益的反面经验。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觉悟程度……

——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①

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整理而成的。之所以选择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第二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研究风格引领了很多西方学者去追随。^②一提及年鉴学派及新史学，人们很容易会想到长时段、结构分析、包罗万象的总体史研究。这种历史观在布罗代尔的《15 至 18 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③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在他的研究方法之下综合地展现出来，这是布罗代尔的成功之处。换言之，他那种层次

①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序言，第 2 页。

② 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第二代历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他认为决定历史运动的有三方面因素，表现为长、中、短三个时段。自然环境、社会组织和思维模式是长时段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经济现象的起伏兴衰则在中时段中起作用；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则只对历史进程中的短时段起作用，不产生根本性影响。他特别强调“全面的历史”，为此，他用层次分解法来研究历史：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放在首位，其次是中层因素（经济局势），最后是昙花一现的“尘埃”（政治事件）。

③ [法] 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 至 18 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2002 年。

分解法适合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然而，由于历史上丰富的事件和人物的活动被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感觉到其研究著作充满了乏味的图表和曲线，缺少一种“感情”，或者说缺少一种“人情味”，有人甚至将其称为“没有人的历史”。^① 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因为人的参与，使得社会丰富多彩。人在历史中的活动，一方面彰显了道德良知，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私欲和贪婪以及人情冷暖；一方面促进了国家间密切交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和残酷杀戮；一方面推动了科技和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总而言之，人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历史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又是非常的复杂，所谓的“总体史”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把握总体史又谈何容易。历史研究探讨的是跟人类有关的历史，要围绕着人们的生活来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皓首穷经、长篇累牍却不能引起人们注意和思考的成果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所以，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勒华拉杜里扬弃了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大力提倡运用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来研究历史，即“试图创立一种研究人们心理、心态的历史学方法，以便对历史上的集体心理进行探讨”。按此方式撰写的《蒙塔尤》，出版后十分畅销，甚至超出了作者的想象。说明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② 此种历史研究方法对笔者的思想有很大触动，这是本书采取对人物进行研究的第一个原因。

2003年夏天，笔者旁听了暨南大学历史系的一次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

① 小何整理：《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和中国史学——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有感》，载《法兰西论坛》网络版，2001年1月。网址：<http://www.puxijin.com/sinofrance/site/tribune/free/0/3.htm>。

② 《蒙塔尤》于1975年在巴黎出版，全称是《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透过这个标题，读者已可了解其研究之一斑。勒华拉杜里对蒙塔尤这个小村庄的研究是根据主教雅克·富民埃——后来任教皇伯努瓦十二世——任帕米埃主教时的审判记录而进行的。这个审判从1318年到1325年，共进行了370天，计578次审讯，总共涉及案件98个，有114人受到起诉或者追究，其中48人为妇女。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这些被追究者中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如农民、工匠、小贩等。第二，审讯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可以反映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而且可以反映居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正如小何所认为的：面对同样一份记录，并非每一个研究者都能挖掘出其中蕴涵的丰富内容。在被发现的一个世纪以来，曾有不少学者知道这份记录并利用它做了某些方面的研究，如德国的多林格尔，研究法国的教派与罗马教皇的冲突以及宗教异端；法国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如夏尔·莫里尼埃、杜埃和维达尔等。然而，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部可以像《蒙塔尤》一样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当然应归功于勒华拉杜里这位年鉴派第三代新史学家的学识和才能，特别是由于他运用的方法得当。（小何整理：《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和中国史学——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有感》。）

会，当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的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先生在点评某篇论文时说过的一段话对笔者的学位论文选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大意是：历史是有关人类的历史，任何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从某种程度上说，把握住了人，也就把握住了历史。这段话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共鸣，直到今天，言犹在耳。这是坚定笔者研究历史人物信心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对唐代的三韩人物进行研究，但范围较小，题目是《仕唐三韩人事迹述论》。因为对曾经下了不少工夫翻检墓志铭所查到的有关三韩人的资料非常珍惜，不愿弃掉，所以在经过了反复考虑，并得到诸位老师的支持、鼓励后，笔者决定将研究范围扩展到现在的规模。这也是笔者继续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初衷。

本书所说的入唐三韩人，指的是高丽^①、百济和新罗这三个朝鲜半岛国家的入唐者。之所以用三韩这个称呼，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受布罗代尔研究方式的启发。布罗代尔在阐明他为什么把资本主义的降临提前到1400年和1800年间的原因时说，虽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直到20世纪初才臻于成熟，但他并不对这个“倒置历史顺序的罪过”感到过分内疚，因为“资本主义”这个词能唤起许多联想，“我们为什么不能撇开它过去和现在引起的热烈争论，干脆利用它为我们服务？”^②高丽人、百济人和新罗人在本书中被称为三韩人，与此有一定的类似性。不过，“资本主义”是20世纪初才较多地为人所了解，布罗代尔把它提前到本不存在的15到19世纪；而“三韩”是在高丽、百济、新罗立国之前业已存在的称呼，本书把它拉到其实际消亡之后的三国时代。

对于三韩的位置，《后汉书》记载：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

① 据魏存成《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载《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考证：高句丽、高丽两个名称中的“丽”字，有时写成“骊”字。其中有的是在同一部史书中，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如《三国志》的《毋丘俭传》和《三少帝纪》在记载毋丘俭讨伐高句丽之事时，用的皆是“高句骊”三字，而《高句丽传》中用的是“高句丽”三字；再如《梁书·高句骊传》中用的既有“高句骊”、“句骊”（此“句骊”即“高句骊”的简称，如同有的史书中“句丽”即“高句丽”的简称一样），又有“高骊”，尤其是在公元508年对高句丽的诏册中，用的则是“高骊”二字，而在《武帝纪》中所记该年此事，用的是“高丽”二字，其曰：“（天监七年——公元508年——二月）乙亥，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可见，“丽”和“骊”二字是通用的。因此，现在的书刊文章中，除引文原文外，用的皆是“丽”字，即“高句丽”或“高丽”，这已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按：如非笔者特别指明，本书采用的正是此种意义上的高丽，与王建所建的高丽国所指非同。

② [法]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前言，第3页。

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①又，《三国志》记载，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②而据考证，汉四郡的位置是：玄菟郡最北，乐浪郡在其南，真番则更在乐浪以南，临屯则在乐浪以东与玄菟东南的海边。据此可以看出四郡的概貌。^③所以，三韩当本是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民族。

而关于三韩族源的探讨，至今仍没有定论。罗继祖认为：韩是由三种民族合成的：一种是商族，即箕子一支和随着箕子入海的一批商族遗民，是为辰韩；一种是当地土著民族，亦即当地的原始邑落，这部分人数最多，占地最广，是为马韩；一种是周族，有一部分人渡海东去，即三韩中的弁韩。弁韩与辰韩同属华夏族。^④刘子敏认为，“三韩”是在“辰国”（古“辰国”应是朝鲜半岛南部的一个原始地名，并非真正的国家实体）地区发展起来的三个部落联盟，这三个部落联盟内部的诸成员，到后来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最终导致了新罗、百济的崛起。^⑤

其二，本书称三国人为三韩人，还因为“三韩”这个称呼直到隋唐乃至宋、明代还被人用来称呼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如隋炀帝大业八年（612），虞绰从炀帝东征高丽，曾奉命作铭曰：

来苏兴怨，帝自东征，言复禹绩，乃御轩营。六师薄伐，三韩肃清，龚行天罚，赫赫明明……^⑥

《隋书》修撰者也曾论曰：

开皇之末，方事辽左，天时不利，师遂无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频践三韩之域，屡发千钧之弩。^⑦

唐朝初期，唐太宗欲亲征高丽，谋划出兵，“（褚）遂良以太宗锐意三韩，惧其遗悔”，翌日上疏进谏。^⑧永徽二年（651），针对朝鲜半岛三国连

①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② 《三国志》卷30《东夷传》。

③ 周振鹤：《汉武帝朝鲜四郡考》，载《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 罗继祖：《辰国三韩考》，载《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⑤ 刘子敏：《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探讨》，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⑥ 《隋书》卷76《文学传》。

⑦ 《隋书》卷81《东夷传·史臣曰》。

⑧ 《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

年相互征战的情况，唐高宗降玺书给百济王扶余义慈曰：“至如海东三国，开基自久，并列疆界，地实犬牙。近代已来，遂构嫌隙。战争交起，略无宁岁。遂令三韩之氓，命悬刀俎，寻戈肆愤，朝夕相仍……”^①新罗贵臣金庾信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曾对新罗王金法敏说：“今者三韩为一家，百姓无二心，可谓小康。”而史载新罗王金法敏“姿表英特，聪明多智略，始一三韩，克成前志”。^②圣历二年（699），鸾台侍郎狄仁杰上表武则天，请求恢复原高丽国：“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诚愿陛下以存亡继绝之义，复其故地。”^③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下诏给新罗王金兴光，称其为“二明庆祚，三韩善邻，时称仁义之乡，代著勋贤之业”。^④

唐人的墓志也有称呼朝鲜半岛地区为三韩的情况，如武周天授二年去世的高丽人高玄，其墓志铭称其为“辽东三韩人”。^⑤

直到宋代乃至明代，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有时仍被中原王朝称为三韩。^⑥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本书采用“三韩人”这一提法。

目前，学界涉及入唐三韩人研究的专著、文章不少，主要见于蕃将研究、民族研究、中外关系研究等研究成果之中，这些研究大多在论述时涉及部分三韩人。关于蕃将研究的专著，主要有章群的《唐代蕃将研究》^⑦和《唐代蕃将研究（续编）》^⑧、马驰师的《唐代蕃将》^⑨，这几部专著对入仕唐土的三韩人有较多载论；关于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著中，谢海平《唐代在华蕃人生活研究》^⑩、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⑪、刘永智《中朝

① 《旧唐书》卷199上《百济传》。

② 《朝鲜史略》卷3。

③ 《唐会要》卷73《安东都护府》。

④ 《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第三》。

⑤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天授015，第317页。录自张宁生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⑥ 《宋史》卷487《高丽传》载：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浙东路马步军都总管杨应诚认为宋可以结交王氏高丽，共谋金国，乃上言：“由高丽至女真，路甚径。请身使三韩，结鸡林以图迎二圣。”《明史》卷320《朝鲜传》载：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李成桂废高丽王昌，二十四年（1391）八月，明太祖曰：“三韩君臣悖乱，二纪于兹。今王瑶嗣立，乃王氏苗裔，宜遣使劳之。”

⑦ 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87年。

⑧ 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91年。

⑨ 三秦出版社，1987年。

⑩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⑪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关系史研究》^①、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②、蒋非非、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③、[韩]金文经《唐高句丽新罗侨民》^④、[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⑤、[韩]权惠永《古代韩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⑥、[韩]卞麟锡《唐长安의新罗史迹》^⑦、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史研究》^⑧，等等，都对入唐的三韩人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关于入唐三韩人研究的文章也不少，较有代表性的有傅玫的《在唐朝境内生活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人》^⑨，文章的涵盖范围与本书相同，都是对入唐三韩人的问题进行论述，分为四部分：“唐初因战争而被迫迁居唐土的高句丽和百济人”、“因奉使或宿卫来唐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人”、“入唐的留学生和求法僧人”、“生活在唐朝境内的新罗平民”。傅先生此文探讨的范围主要是有关史籍以及《太平广记》、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的三韩人，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对碑志资料所涉及的三韩人的情况还没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个缺憾。韩国卢泰墩《高句丽遗民史研究——辽东唐内地의突厥方面의集团을 중심으로》^⑩、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⑪、卞麟锡《唐宿卫制度에서 본罗唐关系》^⑫，主要就部分入唐的三韩人进行论述；另外，还有一些是对近年来新发现的出土墓志的个案考述，等等。总之，对于入唐三韩人的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就笔者愚见，目前学界还没有人进行。在诸位学界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试图尝试做这一填补性工作，或可以抛砖引玉，为唐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的研究尽一份薄力。

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和朝鲜、韩国之间，存在着高（句）丽的归属之争。当2004年7月1日中午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项目通过了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审议，成为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地的第

①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④ [韩]日新社，1986年。

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⑥ [韩]一潮阁，1997年。

⑦ [韩]亚细亚文化社，2000年。

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⑨ [韩]《春史卞麟锡教授甲寅纪念唐史论丛》，1994年。

⑩ [韩]高丽大学校：《史丛》总第11辑，1966年。

⑪ [韩]《韩佑勋博士停年纪念论文集》，1981年。

⑫ 《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事、经济、民族、宗教、艺术等各方面。但是，对入唐三韩人进行研究的时候，所遇到的难题是，按照史书记载，入唐的三韩人人数当有数十万之多，然而仅凭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正史、笔记小说、碑志等资料的相关记载，入唐三韩人数却相对较少。如何让目前所了解的入唐三韩人情况尽量反映出当时的基本社会现状，是本书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基于上述情况，本书拟对这些已发现的三韩人情况按照不同专题进行分类论述。然而，所考论的对象是当时社会中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的日常社会活动必然至少涉及上述的数个领域，这就决定了在论述过程中，有些领域内的人物会多次出现。本书尽量按照人物活动的主要方面进行探讨，以减少重复论述。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三韩人的入唐概况 / 1

第一节 高丽人入唐概况 / 1

第二节 百济人入唐概况 / 6

第三节 新罗人入唐概况 / 9

第二章 入唐三韩使者考论 / 14

第一节 入唐高丽使者情况考论 / 15

第二节 入唐百济使者情况考论 / 33

第三节 入唐新罗使者情况述论 / 38

第四节 新罗对唐纳质宿卫述论 / 51

第三章 入唐的原百济、高丽王室以及权臣事迹考论 / 65

第一节 唐朝对原百济王室、高丽王室及权臣的安置 / 66

第二节 高丽王室后裔和百济王室后裔在唐（武周）朝事迹述论 / 72

第三节 高丽权臣泉氏家族成员在唐（武周）朝的不同命运 / 81

第四章 两《唐书》列传记载的三韩籍蕃将事迹丛考 / 96

第一节 两《唐书》立传记载的高丽人仕唐事迹评述 / 97

第二节 史书中列传记载的百济人事迹述略 / 119

第五章 未被史书列传记载的三韩籍蕃将事迹丛考 / 130

第一节 散见于史籍记载的仕唐三韩人 / 131

第二节 志石资料和笔记小说中所见的三韩人事迹考 / 147

第六章 参与发动或平定唐朝宫廷政变的三韩人 / 169

第一节 唐中宗时期参与（平定）宫廷政变的三韩人 / 170

第二节 参与唐玄宗宫廷政变的三韩人 / 173

第七章 唐朝商业领域内的三韩人 / 182

第一节 三韩使者在国家交往中的商人成分 / 183

第二节 三韩商人阶层在唐朝的活动 / 186

第三节 唐朝境内与新罗商人有关的物产、地名及事迹 / 192

第八章 入唐的三韩僧人 / 198

第一节 卷入政治事务的三韩僧人 / 199

第二节 与三韩僧侣有关的唐朝地名 / 204

第三节 入唐三韩僧侣的汉语水平考辨 / 206

第四节 三韩僧侣在唐的其他事迹 / 208

第九章 唐朝的三韩籍奴婢 / 213

第一节 由战俘而被变为唐朝奴婢的三韩人略说 / 214

第二节 被劫掠贩卖及因灾荒而入唐为奴的三韩人 / 216

第三节 入唐的新罗奴与昆仑奴比较 / 222

总 结 / 228

附 录 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 231

参考文献 / 241

后 记 / 257

第一章 三韩人入唐概况

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胸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

—— [美] 谢弗^①

第一节 高丽人入唐概况

一、唐朝之前中原与高丽之间的人口流动情况

在对高丽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情况进行了解之前，有必要先了解高句丽族的族源与高句丽国的源起。

有人认为高句丽的“族名族源均与中国古代高阳、高辛等远古民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的‘涂山之会’有高句丽始祖解扶娄‘执玉’之贡献”^②，高句丽族之先祖和中原似乎早在太禹时期就有交往。还有学者据《朝鲜鲜于氏奇氏谱牒》所载“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认为随从箕子入朝鲜的人有相当数量。^③ 这部分人也是高句丽的族源之一。

① [美] 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② 傅朗云：《东北亚历史民族——高夷、高丽、高句丽》，载《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1期。

③ 杨军：《公元前朝鲜半岛的民族迁徙与融合》，载《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3期。

高句丽于公元前 37 年始建国。从那时起，就一直处于西汉王朝高句骊县的管辖之下。也就是说，先有高句骊县，后有高句骊国。“高句骊国是夫余人的一支南下与西汉王朝高骊县境内的其他民族或部族联合建立边疆政权时用了高句骊县的名称。至于高句骊族的形成，可以说它是在高句骊国建立之后的事情，高句骊建国后其部众分为‘五部’或称为‘五族’就是在高句骊建国时高句骊族尚未形成的反映。”^① 据马大正等学者的研究，高句丽族的主源是秽貊族解体后东迁的各支后裔，有高夷、夫余、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夫余人有十万以上、沃沮人有近五万、东秽人有四五万、小水貊有两三万人先后融入了高句丽族。古代朝鲜移民（后裔）和汉人是高句丽族发展壮大的又一来源。《东国史略·箕子朝鲜》记载箕子率领五千人入朝鲜，这五千人发展到汉初当有数万人；秦末陈胜起义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② 西汉卫满及其孙右渠等招徕入朝鲜的人数也有 10 ~ 15 万人。晋代没入高句丽的汉人有 15 万以上，其中一半或三分之一的人成为高句丽人。此外，高句丽族还融合了肃慎人、鲜卑人、荇人、盖马人、句茶人、契丹人、百济人等。^③

上述移民及其后裔在高句丽国的扩张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高句丽族。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屡起冲突，其民众被迁入中原的情况也有记载。江统《徙戎论》中说：“荏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④ 据唐长孺先生考证，荏阳一带的土地自后汉至曹魏时一直荒芜着，毋丘俭迁徙高句丽户的目的就是为了开辟荒土，^⑤ “五胡之乱”后，荏阳这支高句丽移民已经同化于各族之中。其后的前燕慕容皝政权都迁徙不少高句丽人人内地。咸康七年（341），慕容皝大败高丽，高丽王钊单马而遁。慕容皝掠高丽男女五万余口而归。^⑥ 由于有先例在前，所以唐朝大规模迁徙高句丽遗民入内地，在朝内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与贞观初期朝中热烈讨论如何安置突厥余

① 李大龙：《从高句骊县到安东都护府——高句骊和历代中央王朝关系述论》，载《民族研究》，1998 年第 4 期。

② 《三国志》卷 30《魏书·东夷列传》。

③ 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1 ~ 46 页。

④ 《晋书》卷 56《江统传》。

⑤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年，第 133 页。

⑥ 《晋书》卷 109《慕容皝载记》。

众的情形构成鲜明对比。^①

战争导致高丽、中原之间的人口较大规模地流动，到隋朝达到了一个小高潮。隋朝三次征讨高丽，不仅没有克复成功，反而丧失了数十万精锐兵众，相当多的隋军士兵因被俘或其他原因而滞留高丽。而大规模的高句丽族人迁入中原发生在唐代，起因于唐对高句丽的统一战争。

二、高丽人大规模迁入唐朝内地

早在隋朝时期，随着突厥的分裂^②和高保宁割据势力的消灭^③，高丽与隋朝统治地域直接接触，二者冲突升级。开皇十八年（598），高丽王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④以此为开端，隋文帝、炀帝对高丽发动了几次战争，力图把高丽统一到中国的直辖版图内，均没有达到目的。“一个安定的东北边境并没有形成，这一历史使命，自然落到了隋的后继者唐王朝的肩上。”^⑤

李唐代隋后，致力于平定国内割据的群雄，对边疆民族基本上采取了和平的姿态。对于高丽，唐高祖甚至一度想放弃对高丽的宗主权，被大臣制止。^⑥

武德五年（622），唐高祖“以隋末战士多没于高丽”，因而“赐高丽王建武书，使悉遣还。亦使州县索高丽人在中土者遣归其国。建武奉诏，遣还中国民前后以万数”。^⑦其实，高建武并没有把滞留在高丽的华人全部放还，

① 刘春英、姜维东：《唐王朝对内迁高句丽人的安置措施》，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② 详见《隋书》卷84《突厥传》。

③ 高保宁，即《北齐书·高宝宁传》中的高宝宁，本为北齐营州刺史，北齐灭亡后，高保宁不臣周、不臣隋，保持割据。营州治所位于辽西走廊，北通契丹，东接高句丽，西邻突厥，地理形势及战略位置都很重要，历来是中原王朝经营东北的前沿阵地。而高保宁所倚仗的契丹、靺鞨之众，都是高句丽的势力，高保宁作为中原王朝的反叛势力，同时又成为高句丽与突厥沟通的中介。（蒋非非、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85～86页。）

④ 《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二月甲辰条。

⑤ 蒋非非、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90页。

⑥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载：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诏述朕此怀也。”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高祖乃止。

⑦ 《资治通鉴》卷190，唐高祖武德五年条。

仍有很多华人滞留于高丽。^① 贞观二年，即武德九年（628），高丽向唐太宗进献《封域图》，对唐表示服从，但这并不诚心，因为之前二年（626），高丽就已封锁了百济、新罗的入唐道路，并与之争夺领土；贞观五年（631）在唐派人拆毁高丽以隋战亡士兵骸骨所筑的京观时，高建武修筑千里长城回应，^② 都是高丽对唐戒备的表现。贞观十六年（642），高丽权臣泉盖苏文弑国王高建武，立建武的侄子高藏为王，并自任莫离支，引起唐朝君臣的极大关注。^③ 次年高丽与百济和亲通好，企图攻取新罗党项城，以阻断新罗的入朝之路，致使唐对盖苏文再也无法容忍下去。^④ 唐太宗派人劝诫无效后，决定收复中国的失地，消除以后可能的隐患。^⑤

此后，唐太宗和其后继者高宗李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对高丽展开了数次讨伐，最终灭掉高丽。对于灭亡高丽的过程，正史有详述，本书从略。在征战的过程中，有大量的高丽人被迫迁入唐朝内地：唐太宗“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⑥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这七万人中，包括“李世勣等拔

① 据《隋书》卷61《宇文述传》：“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除了战死的士兵之外，当有为数甚众的隋人定居于高丽；又据《新唐书》卷220《高丽传》，当后来唐太宗派陈大德出使高丽时，“见华人流客者，为道亲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夹道观”。这些所谓的华人流客当有不少是在隋末战争中滞留高丽的。

② 《新唐书》卷220《高丽传》。

③ 作为宗主国，唐朝有对藩属国进行监督、维护其统治秩序的权利和义务。盖苏文的弑主无疑破坏了其统治秩序，理应受到唐朝的制裁。但因为唐太宗君臣考虑到高丽和唐朝的具体情况（高丽新丧主、唐山东地区社会凋敝、盖苏文必定严设守备），最终还是决定对盖苏文静观其变。

④ 对于唐朝来说，新罗是维持朝鲜半岛三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一极。如果新罗灭亡，弱小的百济对于强大的高丽来说力量微不足道，则高丽势必坐大，必吞百济而雄霸半岛。随之必向西方的唐内地扩张，唐朝的东部边境就无宁岁。

⑤ 唐朝的这一思想，体现在唐太宗对待臣的一席话上，《资治通鉴》载：“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惟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扰故也。”

⑥ 据《新唐书》卷220《高丽传》载：“有诏班师，拔辽、盖二州之人以归”，则似岩州户口并不在入唐之列。且唐太宗在接受白岩城（岩州）城主孙伐音投降时也表示赦免城中百姓。在遭到李勣反对时，唐太宗说：“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戮，虏其妻孥，朕所不忍也。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唐太宗遂接受白岩城的投降，“获士女一万，胜兵二千四百，以其城置岩州，授孙伐音为岩州刺史”（《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据此来看，岩州百姓避免了沦为奴婢的命运，似乎没有被迁入内地。对于迁移高丽户口，《册府元龟》卷117《帝王部·亲征第二》记载：“（贞观十九年）九月癸未，太宗以季秋草枯，辽塞寒烈，敕诸军收攻安市城器械，即命班师。先遣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十月丙申朔……凡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内地前后七万人。”表明辽、盖二州的迁移在先，岩州的户口是随后内迁的。大概是后来唐太宗对于岩州的民户不放心，在内迁辽、盖二州之后随即命令其内迁。《册府元龟》的记载应当是翔实可信的。